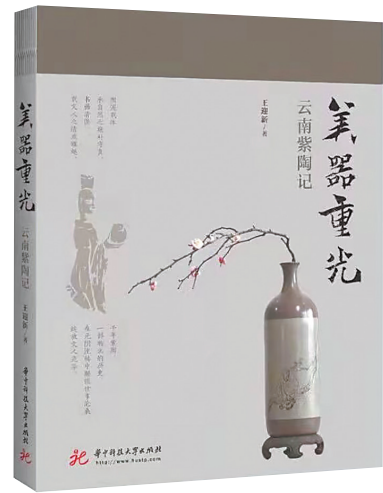


云岭阅读

大美紫陶 人文化成

——读《美器重光：云南紫陶记》

杨蓉



近期，王迎新的新书《美器重光：云南紫陶记》引起了国内茶界和陶界的广泛关注。

出生于云南茶文化世家的王迎新有良好的美术专业功底，深耕中国茶道文化，在多年的实践中提出了“人文茶道”的理念并构建体系。2005年至今，王迎新已出版《吃茶一水间》《人文茶席》《山水柏舟一席茶》等多部专著，于是，从茶至器，从美学到人文精神，这些元素共同构建了《美器重光：云南紫陶记》的厚度与深度。王迎新认为：紫砂产生于江浙地区，最初以绿茶和红茶的冲泡品饮为主。云南建水紫陶很多壶形都在模仿紫砂壶，其实并不适合冲泡大叶种的云南普洱茶。基于此，她特别创意设计了紫陶十八式，目前已经做出了9个器型，分别对应于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并投入使用。其中，春三月的“观止”壶，置心一处，觉照天地水火，若养其间。圆钮，短直流，圆桶身。壶壁宽阔，可刻绘装饰的余地较大。根据饮茶人数设大观止、中观止、小观止，适合冲泡陈年普洱熟茶、生茶、红茶、陈年岩茶。又如秋三月的“玉衡”壶，斗柄指西，天下皆秋。应时而成，侍秋之茗汤。圆钮，平盖，高肩，肩部浑圆，腹部线条提高，圈足里收。或绘刻清供、煎茶图式；或临法帖片语、唐诗几句。适合秋季冲泡陈年普洱熟茶、生茶。

而陶瓷器的审美，重点在哪里？王迎新认为：工艺之美和艺术之美是有区别的，艺术之美主要体现作者的个人主观意向，而工艺之美要落实到器物的实用功能。陶瓷器首先是功能使用，器物设计的科学性很重要，要符合人体工程学，符合我们行茶时对器物使用时的身体肌肉记忆，这样的茶器才能契合茶的需要，让我们泡出好的茶汤。期待茶、器、法三位一体的实践，为重构云南建水紫陶和普洱茶深度融合的审美体系带来思考。这是王迎新研究紫陶的初衷，也是云南茶和云南陶有历史意义的一次际会。

王迎新热爱建水这座古城，热衷于在街头巷陌的烟火气里寻找建水人文风土的蛛丝马迹，她在黄昏时和当地人一样去大板井取水，但看到的更细微：“大板井畔供奉着龙王，还有一棵高大的树，一早一晚很多当地人来取水，一人提两只乳白色的塑料桶。打水的桶是公用的，一只乳白，一只翠绿，拴着牢实的尼龙绳子，大家轮换着将水桶扔到水面，摇晃绳子让水桶侧翻注满水，提起来倒到自家的塑料桶。大概因为井水一向清冽，人们倒的时候也不特别小心，常常洒了许多在地上，井栏前的青石板地就总是水汪汪地，映出蓝天和树影，取水的来来

往往，几十桶水取走后，井水也未见浅下半分。有一次，我找了只小塑料桶取了一桶回去，晚上在工作室用炭火炉子煮开，冲濡了普洱熟茶和生茶来试，熟茶的汤感要厚实一些，生茶的香气稍逊。”

因为在建水所往之处又多是隐逸的所在，所以书中有这样的趣事：“往来静庐的多文人雅客，不小心就能遇见一两个故人。某年的一个秋夜入住静庐，晚上出去逛了一会朝阳楼，回来便准备休息。刚准备躺下，听见木格子窗外飘进琴声，不免披衣出去。原来是一位好几年没见的友人，不算很熟络，但还是习琴时的同门。院落里月色如水，寒暄几句，复归屋，听着琴声睡去。”

“师法天地”一直是中国文人的哲学观和格物观，孔子、司马迁、李白、徐霞客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都曾壮游，并极大地提升了自己的生命格局。这些年王迎新学习先贤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所至之处无论是济宁岗山中的摩崖石刻、莫高窟的壁画、榆林石窟中吴道子的线条、云冈的佛像、麦积山中的“窃窃私语”、青州绝美而慈悲的面孔、青城山宝瓶口的急流、泰山的大字《金刚经》，还是云南广袤的茶山、武夷山、云台山、景德镇、建阳、龙泉，这些饱含着东方艺术精神和自然妙造之地，都给了她无尽的滋养。

行走无疑为她书写和观察建水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关于建水文庙她这样写道：

曾访山东曲阜孔庙与尼山孔庙，曲阜孔庙占地广阔，建制严谨。中轴线上的建筑依次为先师门、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碧瓦朱甍，古柏参天。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文庙的“礼”和“乐”古往今来代表着人文教化的最高境界，来自先贤的

精神感召与唤醒通过具象的形式延续千年。而矗立在建水古城闹市中的文庙，始建于元朝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建筑規制如法，进得“太和元气”坊，一泓“学海”清波荡漾，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明伦堂、尊经阁各自耸立。中轴线上的杏坛，上铺金黄色琉璃瓦，内饰十八藻井，坛内有明代的“孔圣弦诵图”石碑。以前石碑周围没有建国栏，很多学生考试前要去摸一摸石碑上的孔夫子的额头，以求得考试顺利。时间长了，夫子额头油润光亮。杏坛的左侧有奎星阁、名宦祠、金声门，右侧是乡贤祠、玉振门。奎星阁、文昌阁内供奉“奎星星君，文昌帝君”寓“奎主文章，魁星点斗，文运昌盛”之意。

庙外紧挨着民居与街道，仔细听有往来的市井人声，反而在建水文庙更有一种勃勃生气，一种历经岁月依然没有断裂的内在力量。2014年菊月，曾在先贤殿前举办茶会，后有文记：渝茶间柏香袅袅，不免感慨，“流而不返者”是光阴，“不以时迁者”其实是我们骨子里深厚的中国情怀，茶如是，可入世。德不孤，必有邻。

这场茶与紫陶的深度融合的茶会，因缘巧合得以在文庙举办，在王迎新的我心中自然分量不轻。

行走也为王迎新在紫陶上的创作提供了源头活水般的灵感，她把阳光峰隧前的茶会，把莫高窟的“王子抚琴图”画在“观止”秋天，把建水郊外的菊花圃的秋菊画在秋天的“玉衡”壶上，把湖北赵李桥丛林里的茶会画在博古瓶上，把武夷山五夫古镇朱熹故里的半亩方塘刻在“担当”壶上。这些器物变得有了人文的温度，每一件都是现实中理想国般的存在。

我们在追溯中国陶瓷史的时候，陶瓷每往前走一步，我们的文明就向前跨一步，它不仅影响我们生活的变化，也带来我们文明程度的外显。建水紫陶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我们在建水紫陶上看到浓浓的的人情味、很深的人文气味以及美学装饰，在云南陶的发掘里有着丰富的体现，在中国陶瓷里面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建水紫陶的工艺非常复杂，工艺难度大，成品率低，但是它的表现形式很高级，如残缺，将文人的“锦灰堆”再现出来，就是一种文人符号的外显。这不仅需要创作者的灵感，更需要独具匠心。王迎新认为：建水紫陶在未来如果有更多的学者、文人、茶道艺术家、设计师参与进来，一定会出更多的作品和艺术品。所以她说过写作《美器重光：云南紫陶记》的心愿就是：把小我之爱化为天下公器。

书生真情慰孙犁

——孙犁图书收藏记

胡忠伟



出版社拖了一年多时间，引起孙犁的不悦，1984年8月31日孙犁致郑映山信中写道：“因稿件刊登太慢，亦系作品不受欢迎，我今年写作很少。《远道集》拖了一年多，才出样书，明年的一本名《老荒集》已交上海出版。”我们知晓，孙犁是敏感的，他的《老荒集》“远嫁”上海文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本《老荒集》纳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丛书》之中，1986年2月初版，印数2300册，这本比之前的《晚年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百花版的开本稍大，容长形，小32开本，除过题图和尾花，增加了整页的插图、装帧和版式看起来十分漂亮。

《老荒集》之后的几本，除了《无为集》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外，其他几本又给了百花文艺出版社。所以，这10本小书，最初的单行本，开本虽都是小32开，但尺寸长短不一，形成一种参差美。而正是上海文艺版《老荒集》和人文版《无为集》，引动了这10本小书价钱的上漲。这两本在网上售价都在300元以上，让人望书兴叹。

1999年5月，山东画报出版社首次以《耕堂劫后十种》为总题，集中出版了10本小书，为爱书人收藏孙犁的著作提供了便利。山东画报版《耕堂劫后十种》，孙犁研究专家刘宗武主编，汪稼明责任编辑，蔡立国装帧设计，小32开本，印数5000册，墨绿色皮纹纸书封，封面左上角为银白色的孙犁头像和签名手迹，右下角为白色方正小标宋字体的书名，书名的上一行印着“耕堂劫后十种”6个黑体小字，下印着

为编辑说明，说明编辑出版本书的缘由，后书舌为本套书的总书目。封底则刊有编者刘宗武撰写的《校读手记》，介绍了每一本集子的版本、内容和艺术特色，连缀起来看，就是对孙犁晚年写作的10本书的综合评价。更为可贵的是，本套书不仅版式小巧灵便，易于携带，是名副其实的“口袋书”，而且书中还插入大量珍贵的照片、手迹、书法等资料，为读者理解文章写作背景等提供了有益的补充。

我曾买过上海文艺版《老荒集》，逐篇细读了一番。但这本书在我手里只存放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就被山东一书友软磨硬泡买走了。书出手了，反倒有一种失落感，像是自己心爱的女儿嫁到了深山里，时时牵挂着她的安危和冷暖。特别是每每看到其他9本小书还都齐整地摆放在我的书架上，这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就越发强烈了。

今年是孙犁逝世20周年紀念，各地都有大动作，出版了好多书来纪念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好华编著的《孙犁年谱》，是对他老人家最真情的告慰。通过阅读此书，我了解到出版孙犁10本小书的经过和其中的曲曲折折，就产生了重新找回《老荒集》的想法。上网搜索，经过一番比较，价位、下单，《老荒集》又回到了我的手中，真是“曾在我家今又回，书生真情慰孙犁”。

攻坚掉这一本，剩下《无为集》了。《无为集》印数少，据说只有2800本，又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流散出来的就更少了，所以其价奇昂。一本书花去四五百元大钞，对穷书生而言，真有些舍不得。可喜的是，那套文艺版的还是要在网上淘了一本复印本，花去一百元。复印本虽说也清晰能读，但终究与真品隔了一层。所以，时时念念的还是要买一本真品回来，读书人本来就对版本很挑剔的，何况对心爱的书呢？

如果哪一天真能把《无为集》“请”回来，我就拥有三套孙犁的《耕堂劫后十种》了，即原版的，零散出版的；山东画报报绿皮版的；百花文艺精装版的。看看，我多富有，孙犁老先生若泉下有知，看到一个后生如此喜欢他的书，他也会欣慰一笑了。

娜娜娜珍

奉旨填词柳三变

程应峰

说到柳永，头脑中浮现出的，是一个沉醉在宋代繁华里，放浪形骸，狂放不羁，“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词人。

柳永虽是屡试不第，却能悉心填词，成为宋词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充分运用俚词俗语，铺叙刻画，情景相融，意象新颖，音律谐婉，在当时流传甚广，呈现出“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之情景。

年少时，他读到无名氏词作《眉峰碧》：“蹙破眉峰碧。纤手还重执。镇日相看未足时，忍使使、鸳鸯只！薄暮投村驿。风雨愁通夕。窗外芭蕉窗里人，分明叶上心头滴。”甚是喜爱，将它题写在居室墙壁上，反复吟咏，再三琢磨，痴迷不已。

柳永随了父亲柳宜的性情，对词的兴趣也源于博学精思而能经世致用的父亲柳宜。有一次，柳宜默诵完后主李煜的词曲，想起辛酸的往事不免老泪纵横。这个时候，柳永走到了父亲身边，好奇地问：“爹，你念的是什么？竟这样动情！”他听出父亲所吟句式，字数有长有短，像诗又不是诗，平仄难分，却比诗更朗朗上口。正是这份好奇，让他走上了不倦不息的填词创新之路。

16岁那年，柳永由钱塘入杭州，沉湎于湖山美好、都市繁华、听歌买笑的浪漫生活。那一年，他作《望海潮》一词，描绘出一幅曼妙美丽的北宋杭州意象图，前所未有地展现了当时社会的太平气象。此词一出，广为传诵。许多年以后，金国主读了柳永这阙词，勃发野心，发誓要夺取“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富丽江南，拥有这片神仙境地。柳永也因此被蓄谋已久的好人投毒暗算，这是后话。

22岁那年，柳永踌躇满志，自信“定然魁甲登高第”。及试，却受到真宗“属辞浮靡”之谴责。初试落第的柳永，愤慨之下作《鹤冲天·黄金榜上》。词中，他发泄了对科举的牢骚和不满，但对中举出仕并未完全绝望。仁宗初年再试，他的考试成绩本已过关，但由于《鹤冲天》词上达宸听，放榜时，仁宗以《鹤冲天》为口实着意批示：“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此后，柳永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更是了无顾忌地游妓馆酒楼之间，致力填词创作，他的艺术天赋也因此发挥到极致。

而后，他屡试屡落。一晃，到了公元1024年，他已过了第三个本命年。期间，相好歌女虫娘与他有了嫌隙，更教他苦闷难遣。要知道，虫娘在他心目中的分量可是非比寻常啊！有《木兰花·虫娘》一词为证。柳永考试再三第，加上情场失意，这一年，他愤而离开京师，诀别虫娘。写下了著名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写罢此词，他由水路南下，漂泊而行，东走西突，风尘不止。

又过了10年，仁宗亲政，对历届科场沉沦之士放宽录取尺度。柳永因此得以及第，自是喜不自禁，这时，他已得51岁了。然而，柳永虽有才华，却在举荐过程中因皇族成见，屡受阻挠。一晃又是3年，柳永调任余杭县令，抚民清静，为政有声，深受爱戴。

在词史上，柳永开了将笔端伸向市井平民内心世界的先河，为之诉说心中的苦闷幽微，同时展现了北宋繁华富裕的都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更抒发了他一生宦游沉浮、浪迹江湖的切身感受，意境苍凉，真切感人。张爱玲说：“单车上的少年，在冲向人群的一瞬间突然松开手把，人生的可爱情常就在那一撒手之间。”柳永就是这样一个率真可爱之人。对柳永之词，胡寅以为：“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及。”



书香云南

书写千年古道博南的古与今

——散文集《边屯》读后

赵振王



细读了张继强文化散文集《边屯——古今前沿与后方》（以下简称《边屯》）一书（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才感觉到自己愧对了故乡永平（最初置县“博南”）这块母土。鉴于当年应征入伍前并未到过县城且离开永平较早的缘故，后来每次回家探亲都是来去匆匆，没能静下心来了解永平的历史文化，更谈不上书写和宣传永平，因而，这份愧疚之情就一直以来萦绕在内心深处。

曾任永平县志办主任的张继强写这本《边屯》，其历史的客观性、文化的厚度是值得信任的。这部著作对研究永平的历史文化具有一定权威性，正如序言里所说，“因为追寻这条古道的前沿与后方，他已经用身体中的灵魂之境承载了一条属于他自己人文探索的古道……”（海男）。张继强潜心于文化境遇中对博南古道的探索与发现，尽情书写了永平人文历史的神秘之境，面对博南山的一景一物，哪怕是一颗锈蚀的铁钉，都会唤起他内心深处研读默诵的灵感。他用自己的整个身心去研究永平的历史，这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而且，他始终以高度负责的写作精神，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相对公正客观地发声，而不是固执己见地表述，一味把永平的历史走向以及边屯的由来和存在说得天花乱坠。例如，在叙述永平的边屯史的形成和发展时，张继强能够心平气和地牵引出丽江市永胜县所具有的典型的边屯文化并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分析整个云南边屯的形成和边屯文化的有序演绎过程。每当面对博南古道的历史的脉动和现实的境遇，张继强总是以主人翁的姿态进行书写和讲述，其客观公正性能够让读者信服。

被千年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曲调、花桥（古博南县址）、杉阳、霁虹桥等著名驿站所贯穿的永平县，过境古道长达近百公里。所谓博南古道，就是贯穿苍山西坡

始起、直到过完彩虹桥这段古道的统称，漾濞县城西街至今还保留着“博南路”的地名，就是很好的例证。一直以来，博南古道沿线就是中原皇权伸向滇西大地上的边区触角，通过这条“血肉丰满”的触角，汉朝开始触知了云南的广袤和富庶，同时，中原文化元素也一点一滴地浸润到了云南偏远的滇西地区。

亘古向南奔流的澜沧江，居然在永平境内突然向西北折行了数十里，形成一个大的拐点，其拐点正好温柔地拥抱着博南山，构成了“一江环一山”的地理奇观。永平，自古以来成为“进可以控制保山，补给前线；退能够屏障大理，巩固后方”，进退之间，永平既是前沿，有时又是后方。确定或不确定的历史，我们只有凭着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去面对。眼下一些所谓文化大散文的作者，借古抒怀是做到了，可是，据史实的展开或发挥，就做得不怎么样，主要缺陷就是个人抒怀大于历史文化，在天马行空的大书特书中，少了对于历史真实的学习和应用，文字花哨大于了历史真实，抒情之能超过了文化之能，语言的快感也许是具备了，而历史的厚重却欠缺了，单方面追求发表和出版的风气，这样的所谓文化大散文，不读也罢！张继强多年对永平史学的研究，他关于永平的文章，弥补了历史厚重感不足的缺憾，他的这部文化大散文集曾在大理电视台的“大理讲坛”讲授过，最先接受了大理这个区域内的受众的检阅。依据读者的不同声音，在出版过程中又作过了认真的校订，属于历史可信度较高的文化散文集，为永平的历史文化起到了可以查阅的“资料库”的重要作用。

我读《边屯》，仿佛是在千年博南古道上，穿越过人类难以计数的汗水、泪水和血水，至今仍听到了杨升庵、徐霞客、林则徐和埃德加·斯诺留在永平的悠远脚步声和那些闪着光泽的词语和篇章。

新书推荐

一套文存 精彩展现作家冯至风采

林硕



这套“冯至文存”（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年3月版），选取了著名作家冯至的代表作，包括早期随笔集《山水》、诗集《昨日之歌》《十四行集》、历史小说《伍子胥》，还有译作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海涅诗选》以及评论和讲话的合集《冯至学术论著自选集》，让当代读者再次全面领略这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独特地位的作家的风采。

冯至诗艺的培养源于1930年至1935年留学德国，求学的岁月是寂寞的，冯至后来回忆，在他一生之中，“最寂寞，最彷徨时候的伴侣”就是里尔克，里尔克让他获得了心灵的相聚。里尔克的诗歌不仅表现抒情、咏叹，并且化作探求生存真谛、追索宇宙大问的途径。“纵使这世界转变……惟有大地上的歌声在颂扬，在庆祝”（里尔克诗），冯至接受了里尔克的观念，在至大的寂寞里构造自己的艺术世界。

冯至爱里尔克，也爱歌德，两位诗人风格迥异，冯至却说“二人在他们的时代都感到寂寞”。冯至说，里尔克的寂寞表现为近乎宿命，而歌德的寂寞则是一种境界。从小见大，从个别见全部，从有限见无限，从瞬间见永恒，这种精神生动而形象地贯穿在歌德的诗篇，显示了作为诗的本质的从特殊到一般的功能。冯至学贯中西，连通到中国诗歌的寂寞境界。陆机《文赋》有言：“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世界文学里著名的诗篇都能以这样的气魄开阔人的胸怀，让生命化为不朽。是的呀，古来圣贤的寂寞，必定“秘密而公开地矗立在惊奇的世界之上”（歌德诗）。

冯至爱海涅，因为海涅是那样同情普通的民众。而尼采，我们知道，他也有他的“星辰道德”和“最后的意志”，而布萊希特，富有表现力，是德语文学的又一高峰。冯至在诗歌里与他们亲密接触，他意识到了“这民族自己将要怎样演变”，“还

自有它的前途”。留德归国之后，冯至选择了学院安身立命，先后任职同济大学、西南联大，在喧嚣的时代里，他以诗歌寂寞地抒情，写作成为他的生命诉求。

冯至译诗，也写诗。“我的寂寞是一条蛇，静静地没有言语。你万一梦到它时，千万啊，不要悚惧。”作为1926年风华正茂之时的诗句，流露着青春的忧郁。冯至后来也屡现寂寞之语，比如，“你说，你最爱看这原野里一条充满生命的小路，/是多少无名行人的步履/踏出来这些活泼的道路。”还有《威尼斯》：“我永远不会忘记西方的那座水城，/它是个人世的象征，/千百个寂寞的集体。”此时的寂寞，到达了对现实的此世与超验的彼岸的哲学思辨。德语文学对冯至的影响，不仅是写作技艺，更是思想的穿透力度。

《伍子胥》的创作，牵连与西方之源特别是德国的关系，冯至谈起过创作这部小说的想法，说是受到里尔克的启发，包含着许多浪漫主义的元素，被一种忧郁而神秘的的情调支配着，所遇见的是江上的渔夫与深水边的浣沙女，这样的遇合很美，尤其是伍子胥这样的忧患中人。昭关的夜色、江上的黄昏、溼水的阳光，音乐似的在他的闹钟中闪过，他于是去尽力捕捉。在我看来，《伍子胥》的本质，依然是寂寞，这是一曲“爱与死亡”的寂寞之歌，一个人的寂寞，无法确认的目的地，“他自己也觉得成了一个冬眠的生物，忘却了时间”。伍子胥穿过旷野，渡过河流，翻过丘陵，让生命化为不朽。依然不由自主为生灵景物而感动，冯至笔下的伍子胥，应当是从流浪中领悟到了生死、蜕变，以及人生的大寂寞吧！

冯至译诗、写诗、写随笔、写小说、写评论，他以一种甘于寂寞的立身处世方式做自己的研究和创作，他的文章充满时代烙印，也加重了冯至的寂寞底色，写作如何展示纸背之后的关怀，这正是那一代作家的共同命题。